

旷日持久的论战

——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

学
子
书
斋

前 言

我国的古代格言中，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千古明训，这就是说要办成一件事，首先要解决方法的问题。对于建立与发展一门严密的经济科学来说，方法与方法论的重要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在当今我国经济学界，恐怕很少有人会否认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性，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也同样很少有人对方法论问题给予专门的阐述。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在提出某个理论构想时，似乎并不像他们平时所声明的那样，对方法论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以至一些本不该出现的混淆一再见于报端；而从事应用研究的经济学家在为现实问题苦思对策时，更像是把方法论问题抛诸脑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过于紧迫，使决策人员与研究工作者很难对那些抽象而又遥远的方法论问题提起兴趣。这本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当一个民族面临重大抉择并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时，一个实际行动往往比一打理论探索都更有意义。然而，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终究会使我们付出代价。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不得不在没有充分理论准备和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迎接一系列重大的挑战，并且经常为解决燃眉之急，匆忙运用我们并不熟悉的理论工具于重大决策之中，而对这些理论工具的假设条件、适用范围及本身的局限却又无暇顾及。这很像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运动员，被迫参加决定其命运的赛事一样。错失良机与频频失误是很难避免的，所幸历史终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我们能对经济理论的基础做一些更为深入的思索。本文正是在这方面做的一个初步尝试，希望有更多的经济学同道为此共同努力。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经济学家关于方法论的正面论述，大部分属于

论战文章。也就是说，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诸多观点，大部分是在论战中提出的，或在论战中得到正面阐述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经济学各种流派的分歧，归根结蒂都与方法论的分歧有关。因而，系统研究经济学在其 200 多年发展过程中的方法论，了解经济学家在创立与发展这门科学的过程中，对某些基本问题所持的不同意见，他们的执著追求与困惑迷误，可以使我们对经济科学本身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经济学文献中关于方法论的著述是很多的，但其中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著述都围绕着六个基本的论题展开，即：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经济学原理建立的方法、价值判断问题、假定有效性的检验、预测与不确定性以及经济理性问题。这六个问题很像是一个完整理论框架的六个支撑点，并且依次按逻辑顺序排列，与历史上各次争论发生的先后次序相一致。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所围绕的六个论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们可以很容易从一位经济学家对某个论题的见解，推导出他在其他问题上的看法，除非他出于辨护或论战上的理由而违背他的逻辑。所以，我们虽然在介绍彼此独立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有先后的六次方法论争，但沿着历史和经济学家关注热点的变化，我们很像是在从事对经济学方法论整体结构的考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六次争论一起呈献给读者的原因。

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力求简明，分别以一个独立的章节介绍一次大的争论。由于历史上发生的每一次方法论争都有其思想准备和积聚的过程。了解这一过程对于理解方法论争本身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我们在每章的头一、二节中，介绍每次方法论争的前期阶段和背景条件，以便读者对每一次论争的产生有一个历史的了解。方法论之争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每一次争论的终结都只是在形式上的，它只是意味着大规模的直接论战已经结束，或为新的论战所取代。由于每一次争论都没有得出受到普遍承认的结论，并且遗留下来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在论战之后，仍然不时有关于同一论题的争论文章出现。比如价值判断论争，本来是 20 世纪初发生的事情，但在 80 年代的经济学文献中，仍然不时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争论文章。其中有一些还颇具启发性。有些论战

限于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不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以后，随着经济学本身的进步以及其他学科的成果进入经济学，使人们对同一问题获得了不同的观察角度或更高的观察层次，从而提出了新的见解。考虑到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在每一章的后一、二节，专门介绍每一次方法论争的沿续和以后的发展，以使读者对每一次论争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在每一章的末尾安排了一个短评，作者试图从一个比较超脱的角度评论各次争论，力求不使自己陷入争论的漩涡，以至有意无意地遵从于某一派的观点而不能自拔。对于各种争论观点，作者也避免提出结论性的断语，基本上就是就其论证的逻辑和方法进行评论，更多的东西留待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经济学的方法论在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属于未被开发的领域，本文作者初次涉猎其中，既感到天地广阔，又感到有些茫然，因为可供参照的东西毕竟太少了。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有些恐怕是第一次介绍到国内，如果这些内容能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基本建设有所助益，本人将感到不胜荣幸。

目 录



3 0105 1641 1

前 言	(1)
-----	-----

第一章 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元与经济行为的动机	(1)
------------------------	-----

第一节 个体本位的方法论选择	(2)
----------------	-----

行为与决策的基本单元——个人

自然科学的影响与时代背景

第二节 国家本位的方法论选择	(6)
----------------	-----

国家与国民财富

李斯特的“国民体系”

第三节 经济学的自利原则	(14)
--------------	------

斯密问题

对自利经济人的争论

第四节 利他主义与经济学	(22)
--------------	------

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存在

利他主义的经济行为

短 评	(28)
-----	------

第二章 经济学的“方法论争”	(32)
----------------	------

第一节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传统	(32)
-------------------	------

演绎传统的起源

演绎传统的发展



998418

	老凯恩斯的总结	
第二节	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传统	(37)
	旧历史派的归纳传统	
	对历史学派方法论观点的概括	
	新历史学派的发展	
第三节	“方法论争”的开端——“奥地利学派”挑战	(45)
	争论的契机	
	门格的《方法研究》	
第四节	“方法论争”的展开	(52)
	施莫勒的反击	
	门格的再批判	
	施莫勒的简短答复	
第五节	施莫勒的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	(59)
	国民经济学的定义	
	历史的方法	
	归纳法与演绎法	
短 评		(65)
第三章	“价值判断”论争	(70)
第一节	对解决价值判断问题的初步思考	(71)
	科学与艺术的划分	
	实证与规范的区别	
第二节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73)
	经济学与价值判断	
	社会科学客观有效性的含义	
	理念型	
第三节	价值判断论争的展开	(82)
	对讲坛社会主义的攻击	
	讲坛社会主义的反驳	

第四节	施莫勒的“伦理经济学”	(87)
	道德体系	
	目的论与价值判断	
	习俗的价值判断	
第五节	韦伯的“伦理中立”说	(92)
	职业规范与伦理中立	
	经验科学的非评价性	
第六节	争论形式上的终结：桑巴特的“理解经济学” ...	(97)
	评判经济学	
	规则经济学	
	理解经济学	
	三种经济学的适用范围	
第七节	价值判断论争的延续	(102)
	在德国的论争	
	福利经济学	
	英美经济学家最初关于价值判断的争论	
	隐含的价值观	
	明确的价值判断	
	马克·图尔的划分	
	本世纪 80 年代反对价值中立的浪潮	
短 评		(112)
第四章	“假定之战”	(114)
第一节	假定问题上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	(114)
	经济学的自明假定与内省的认知方式	
	假定的先验特征	
	来自实证主义的批判	
	假定的证实问题	
	双方的争论	

第二节	与现实无关的假定	(127)
	经济理论的本质	
	假定有效性的检验标准	
	假定的有效性与其现实性无关	
	假设的检验与假定的现实性无关	
第三节	最初的反响	(132)
	前提的现实性与理论的证实	
	预测与理论的有效性	
第四节	关于假定问题的全面论战	(138)
	“非现实性原则”的论证缺陷	
	组合法则与不连续的演绎链	
	近似的连续性原则	
	F 扭曲	
第五节	假定之战的继续	(148)
	理论与现实	
	理论的简单性与现实性	
	工具主义与描述主义	
	问题的明朗化	
短 评		(157)

第五章 不确定性与预测..... (159)

第一节	完全预期	(159)
	对完全预期的追求	
	完全预期的假定	
第二节	不确定性	(163)
	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	
	不确定性与“凯恩斯革命”	
第三节	“两个剑桥之争”的方法论分歧	(168)
	时间因素与资本测量	

	资本油面与资本指数	
	资本的寓言	
	未来的不可预见性	
	预测的平均成功率	
第四节	弗里德曼与戴维森关于不确定性的争论	(178)
	争论的由来	
	不确定性与货币特性	
	弗里德曼的反批评	
	有理性的预期	
	短 评	(185)
第六章	对经济理性的争论	(187)
第一节	经济理性的含义	(187)
	对自身利益的精密计算	
	偏好的可递性与一致性	
	对理性原则的历史解释	
	个人的理性与制度的理性	
第二节	经济学与非理性行为	(195)
	经济行为动机的非理性	
	组织的松弛	
	不完全的理性	
	个人的非理性与市场的理性	
第三节	经济心理与经济理性	(206)
	实质的理性与程序的理性	
	多维选择与偏好的可递性	
	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第四节	理性的经济人	(212)
	非现实性和不可检验性	
	理性的白痴	

有限的一致性与聪明的决策者

短 评	(219)
后 记	(222)
参考书目索引	(224)

第一章 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元 与经济行为的动机

经济学各种门派所持歧见，在方法论上表现得极为深刻，且涉及范围也十分广泛，我们可以在许多独立的主题下对它们分别加以论述，但就发展源流和思维的逻辑进程而言，这些分歧都起始于对两个基本问题的不同看法：即经济学应当以什么对象作为其分析的基本单元，以及这些“基本单元”执著行为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围绕这两个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构成了经济学方法论各种分歧的基点，并且引起了另外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建立任何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都必须首先明确它的研究对象和这些研究对象的基本测量单位。诸如物理学中的原子，化学中的分子，生物学中的细胞和基因等等，都是各自学科中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们构成了整个学科体系得以确立的基础。当然，基本分析单元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它取决于人们在科学上（或精神上）所要达到的特定目的，根据这种目的，人们决定哪一个对象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是最适宜和最能说明问题的，对它的进一步分解或舍弃它而选择别的单位，将导致问题性质的转移或引起不必要的复杂化。

经济学的创立者们在他们的伟大工程进行之初，首先面临的也是这样的选择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其间经历了 200 多年的时间，经济学家在这个“原始”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古老的争论在不断地重复，自然科学家对某些问题所取得的普遍一致似乎是经济学家所不敢奢望的幻想。大体来说，经济学在分析单元的选择上，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对立倾向：一种是个人本位的方法论选择，另一种是国家本位、或团体本位的方法论选择。下面，我们分别对它们加以考察。

第一节 个体本位的方法论选择

在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个人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他们对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具有明确的认识，并信心十足，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实现它的活动中，对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变动，他们都能分别做出独立的决策，无需服从别人的指示；经济活动的一切主要环节，都由个人发动并完成，与此相联系，经济活动的结果也直接由个人来承担。这种个人本位的方法论传统是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开始的，虽然在他之前，有些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和魁奈等人，也在其著作中暗示了个人作为经济活动主要承担者的重要性，但明确把个人作为经济分析基本单元的，还应当首推亚当·斯密。

行为与决策的基本单元——个人

斯密论证个人本位的方法论原则是从几条不同的思路进行的。其一是从分工的角度。斯密这样来展开他的推理：他首先明确，一国的财富取决于一国劳动力的素质与技巧的熟练程度，也就是说，劳动力是一国财富的基本源泉，而“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改善，……其大部分，看来是劳动分工的结果”。^① 尽管分工有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效果，但斯密似乎并不认为分工是出于对生产效率改善的考虑，在他看来，分工主要是由于人类交易的天性。然而不管怎样，分工使个人成为相互独立的经济要素和自成一体的决策单元，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进行的。在私有经济的前提下，分工自然以私人财产关系为转移，并与它保持一致，在斯密看来，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就是由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J·M·皮特和索斯出版社1910年版第4页。

从事不同职业，进行独立决策的个人来推动的。

斯密的另一条思路是：经济行为的动力来自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他指出：“每一个人都不断地驱使自己去为他所能支配的资本寻找最有利的用途。放在他心目中的，实际上并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① 斯密进一步论证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饮料，并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或怜悯，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通过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最终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但是，这种促进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实现的，“在这里，就象在许多其他的场合一样，他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促进了与他的愿望无关的目的。与他的愿望无关，这对于社会来说并非总是坏事，通过追逐他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促进社会的利益，比之他实际想要这样做时，来得更为有效。”^② 斯密把传统上认为互相对立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商品经济中统一起来，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通过交换机制的作用，达到了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效果，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经济发展最原始的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将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另外，斯密个人本位的方法论选择与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推崇密切相关，而他对经济自由的论证，首先是从对个人自由的论证开始的。他认为，任何个人只要不违背正义的原则，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为了达到目的，他无论怎样施展他的手段都不能算是过分。个人自由实现了，整个社会的经济自由就会自然形成。这里，斯密所说的经济自由是指一种经济制度，在这个制度内，千百万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行动，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系列自动调节机制。按斯密的话说，就是有这样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调节着千百万个人的经济活动，使经济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J·M·皮特和索斯出版社 1910 年版第 398 页。

② 同上，第 407 页。

协调发展，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

斯密显然认为，公共利益是由每个个人的利益组成的，它的实现只能通过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自由竞争中达到。那些自称为民众谋福利的人很少代表公共的利益，他们不是好心办坏事，就是企图掩饰他们一己的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好代表者就是个人自己。个人自由就是让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愿望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一个人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采用什么要素投入，购买什么物品，怎样消费等等，都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即使出于良好的动机进行干预，也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因此，个人是经济生活中的最佳决策单元。

总括起来说，在斯密那里，个体本位的方法论选择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个人是经济生活中最原始的因素，是分工的最小、也是最有效的单元。他的行为可以由对其动机的解释来说明，而无需借助于外部的因素。他是经济行为的承担者，也是经济结果的直接受益者或受害者。

(2) 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生活的原动力，也是社会利益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

(3) 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代表者，因而个人是经济决策的最佳单元。

自然科学的影响与时代背景

斯密之所以做出个人本位的方法论选择，显然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牛顿经典力学的影响。斯密曾经在一篇题为“论天文学的历史”的论文中，以无比钦佩的口吻谈到：“当艾萨克·牛顿爵士以卓越的天才和洞察力发现，他可以通过一个如此为人熟知的联系原则（如重力）——这个原则完全消除了迄今为止人们在想像中所感受到的全部困难——将所有行星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时，他……达到了……在哲学

中从来没有达到的最大，而且最令人赞叹的改进。”^① 在“关于修辞学的讲座”（1762—1763年的讲课记录）中，斯密写道：当我们发现，通常以为“最不可计算的现象，都从某种原则（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则）中演绎出来，并且在一个链条上统一起来”^②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快乐”。在对牛顿力学的简洁和优美表示赞赏之余，斯密试图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领域，他指出：“……牛顿的方法无疑是最有哲学意义的，在每一门科学中，不管是道德科学还是自然哲学，都具有广泛的独创性，而且比起其他方法也更加迷人。”^③

在《国富论》中，斯密显然企图追随这样一种方法，即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原则出发，推演出整个系统的变化。《国富论》的主要倾向是从个人的经济行为出发来解释整体的市场行为。但也应该指出，斯密对经典力学方法的运用是不彻底和不成熟的。其中经常出现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一方面，他给人的印象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决定了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给自由竞争设立了障碍。例如，他在讨论英国实行贸易自由的时候指出：“希望贸易自由在大不列颠完全恢复如同希望在大不列颠建立理想岛或乌托邦一样的愚蠢，不仅公众的偏见，而且更难以克服的许多个人的私利，都难以阻挡地与这种希望相对立。”^④ 应该指出，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与斯密缺乏一个贯彻始终的严格方法论体系有关。当他从人类一般本质的分析出发来推导经济活动时，他实际上采用的是牛顿经典力学的方法，由于这种方法是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必须舍弃一些具体的因素对前提做出一些假定。但斯密是以全称判

① 亚当·斯密：“天文学的历史”载《哲学课题论文集》纽约1980年英文版第98页。

② 亚当·斯密：《关于修辞学和纯文学的讲座》伦敦托马斯·奈勒及子公司1963年版第140页。

③ 同上，第140页。

④ 亚当·斯密：《国富论》J·M·皮特和索斯出版社1910年英文版第414页。

断的形式“每一个人”来开始他的抽象论述的，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他是在讨论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这样当他转向讨论实际问题时，就与前面的抽象论述发生了矛盾，而斯密本人对这一点似乎并无察觉，这给后人理解他的思想带来了一些困难，对斯密观点在解释上的巨大分歧恐怕也与此有关。

斯密对个体本位的方法论选择显然也有其时代的背景。当时的英国正值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工业资本的迅速成长，要求对外贸易的扩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大，经济自由对于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来说成为当务之急。另外，启蒙运动思想家宣扬的民权意识得到广泛传播，政治思想已经从宗教法规的起源转向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社会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个人的价值，把追求自身利益看成是人的基本权力，并为个人的经济自由辩护，这种观点，代表了经济领域中人本主义的意识和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反映了当时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斯密以后，虽然经济学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但个体本位的方法论原则基本上为正统经济学所继承，并在形式和内容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下面的评介中还会经常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

第二节 国家本位的方法论选择

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元，并不是经济学家的唯一选择，古曲经济学在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攻击，其中首先发难的，是信奉国家主义的经济学家。

国家与国民财富

对斯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最早进行批判的是苏格兰经济学家劳德戴尔 (L·Lauderdale)，他于 1804 年发表《关于公共财富的性质及其来源的研究》一书，指责斯密把国民财富完全看成是私人财富，混淆了

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的界限。他把公共财富定义为“人类认为对其有用而且有益的一切东西的总和。”把私人财富定义为“个人认为对他有用而且有益，但却比较稀少的东西的总和”，^①稀少是私人财富的根本要素，因为它对于测量私人财富的价值是不可缺少的。要增加公共财富，只需增加对于人们有用而且有益的物品总量，而增加私人财富，则必须增加这些物品的价值。因此，在劳德戴尔看来，增加私人财富的方式并不一定能增加公共财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不一定对社会有利。

出生于普鲁士，后在奥地利任职的米勒（A·H·Muller）同劳德戴尔一样，都是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国家理想论》、《政治的原子》和《国家收支原理》等。米勒与斯密力主个人本位的观点完全相反，他从国家出发，认为构成国家的个人除了看作是全体的部分外，就根本无法得到理解。他的名言是：“个人不能站在国家的范围之外”，他把国家解释为“人类活动的总和，是它们结合起来的更大的全体”。个人的财富若失去国家的保障就等于零。斯密以个人为本体的方法论产生出了一系列谬误。如把每个人看成仅为了一己的私利而行动，全然没有更高层次的考虑，这将是极为可悲的。他认为，农夫耕种，第一应为上帝及对工作的爱好，第二应为社会总和和生产，最后才会想到净生产。管理地产是一种公共委托的事务，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他坚持，资本的概念不应仅限于物质的或有形的东西，还应包括所谓精神的资本，其中的要素有商业经验、法律和宗教等等。按照米勒的观点，斯密坚持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还导致了另外一个错误，这就是对自由贸易的鼓吹。他说，斯密假定了一个世界市场，其中各国商人组成一种自立的共和国，分工的原则被推广到国际领域。在米勒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空幻的观点。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各国应当看成是大规模的个人，形体不同，思想与感情不同，活动与生活也不同，因此，不可能采取同样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他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专权。

① 劳德戴尔：《关于公共财富的性质及其来源的研究》1819年英文第2版第57～58页。